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研究参考

第 18 号（总 103 号）

2011 年 6 月 15 日

林毅夫谈国际经济形势与中国发展前景

内容提要：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第九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于 2011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开班。5 月 27 日，公管班全体学员在美国拜访了世界银行总部，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介绍了国际经济形势与中国发展等问题，并与学员进行了深入探讨。

林毅夫指出，当前发达国家的产能过剩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失业率居高不下，部分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大量的短期流动性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宏观管理上的挑战。要解决触发危机的产能过剩问题，需要借鉴中国的经验，超越凯恩斯主义，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致力于消除增长瓶颈、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来解决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

林毅夫认为，中国还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未来二十年仍可能维持 8% 或更快速的经济增长，但需要着力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国际化的开放体系中寻找自身优势、开发增长点。

关键词：产能过剩；积极财政政策；增长瓶颈

国际经济形势与中国发展前景

林毅夫¹

一、国际经济形势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国际经济遭受了 1929 年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挑战。与纽约股市崩溃带来的 19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相比，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泡沫破灭、股市下滑的速度超过了 1929 年的水平，它所引发的国际贸易萎缩、各主要国家工业生产下滑的程度也超过了 1929 年的水平。到 2008 年年末，人们普遍担心世界经济会陷入与 1929 年后相同的大萧条，但国际社会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了深刻教训。在 2008 年年底的 G20 峰会上，世界主要经济体达成协议：第一，对各自的金融体系伸以援手，避免银行倒闭、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倒闭，避免实体经济的资金断流；第二，虽然很多国家失业率猛升，但达成共识、坚持自由贸易。这与 1929 年很不相同，当时各国竞相设置贸易障碍、不让外国产品进口以保障本国就业，结果导致其国内的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在金融和贸易上的这些努力，避免了国际经济的恶性循环；第三，各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资金价格；第四，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到 2009 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第二季度，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实现复苏；第三、第四季度后，发达国家的经济也相继复苏。

目前来看，经济复苏仍然在延续。世界经济在 2009 年下滑了 2.2%，到 2010 年上升了 3.8%，预计 2011 年将上升 3.2%。中国经济在 2009 年增长了 9.1%，2010 年增长了 10.1%，2011 年预计将增长 9%，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但是，触发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些问题仍然存在，并带来新的挑战：

第一，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目前失业率超过 9%，欧洲不少国家的失业率上升到了两位数。第二，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新的波动；与此同时，美国各州政府的财务状况也令人担忧，加

¹ 林毅夫：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的债务问题与欧洲国家的危机相去不远。第三，不少短期流动性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给巴西、南非等国带来宏观经济管理上的挑战。由于大量短期流动性资金进入，新兴经济体的房地产和股票泡沫所带来的挑战较大，这可能迫使其国内货币升值，但又会导致其出口竞争力下降、出口下滑、实体经济增长放缓，最终导致泡沫破灭。第四，国际粮食和石油价格高位运行。国际粮食价格已经超过了 2008 年的最高价格。尽管各国国内的粮食储备状况较好，但有些国家的国内粮食价格涨幅较大，引发剧烈的国内矛盾和社会问题。

当前，触发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并没有根本消除，给国际经济稳定带来新的挑战。问题的主要根源就在于发达国家产能严重过剩。2008 年以前，发达国家在房地产市场和股市上有泡沫，当时的消费需求上升导致供给也大量增加，但泡沫破裂后由于财务状况恶化，需求减少，过去的产能就出现了大量剩余。失业率是产能过剩问题的一个表现，主权债务危机也反映了这个问题。由于失业救济支出增加、政府开支上升，而投资、贸易受到抑制，经济疲软，政府收入下降，人们就会担心这些原本就债台高筑的国家还不了钱。国际资本的流动也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巨大挑战。由于发达国家为了刺激国内需求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资金需要寻找高获利的机会而流到新兴市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宏观经济管理上的困难。国际粮食价格和石油价格的上升，既有需求拉动的因素，也有短期资金投机的因素，因为资金价格低，所以大量资金被用于对粮食和石油等战略物资的投机。

所以，根源即在于过去的高消费、高需求、过度投资在泡沫破灭后引发经济危机。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一般的货币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即使资金价格很低，但发达国家的国内并没有有效的投资机会。所以，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政府启动投资需求，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加以应对。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则认为，政府支出的钱是需要还的，不外乎两种方式：加税或者印发钞票——引发通胀，这两种方式最后都会对居民的实际收入造成影响，使居民即使在有就业的条件下仍然节省开支、增加储蓄。结果，总需求的增加有限，但政府财政赤字积累很快。这就是日本的情况。1991 年日本的负债仅占 GDP 的 60%，

随后泡沫经济破灭，直到现在仍没有走出产能过剩的严重后果。这时宏观经济管理就面临着两难困境：如果不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失业率会上升，经济和社会矛盾会日益突出；如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债务会上升，给金融埋下隐忧，市场信心也很难建立。

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在过去的发展经验中探索出了具有创造性的方法。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出现产能过剩时，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财政政策的效果更直接，但关键在于将来如何还钱。凯恩斯主义举例说政府在路上挖开一个洞、然后又雇人将洞补上，或者发钱给人消费，这都创造了需求，但是它并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生产能力。所以，在需求不足时要创造需求启动消费，必须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用于消除增长瓶颈，提高生产力水平，这样既能在短期内创造就业、增加消费，又能在长期推动经济增长、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既解决当前问题、又解决长远问题。1998 年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与当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类似：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压力上升。在 1998 年到 2002 年，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将大部分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此期间，中国的高速公路从 1998 年的 4700 公里上升到 2002 年的 25100 公里，电网改造、港口和航空设施的建设也取得了明显进展。结果，中国经济不仅成功“保八”，并且消除了增长瓶颈。在 1979 到 2002 年的 24 年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 9.6%，而从 2003~2010 年的 8 年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上升到了 10.8%。2003 年以后持续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并且通胀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而 1998 年之前，只要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那么通胀水平也会达到两位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积极变化，关键在于增长的瓶颈被消除了。从政府的财政赤字水平来看，1998 年的财政赤字水平低于 20%，到 2002 年，赤字水平提高到 35%，但 2008 年，又下降到了 23%，并且在此期间政府还采取了减税措施，公司所得税从 34%降低到 25%，个人所得税也经过了多次调减。

要解决世界经济的危机，需要学习中国经验，超越凯恩斯主义。政府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把钱用在刀刃上，解决经济增长的瓶颈问题。以美国为例，从华盛顿特区到波士顿距离为 220 英里（不到

350 公里)，美国最快的火车需要 2 小时 45 分钟才能到达，而中国的高铁仅需 1 小时。在早期工业化国家，基础设施老旧，这方面存在提升空间。此外，全球气候变化需要绿色增长，在技术的创新和改造方面增加投资，可以减少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失，这方面也有不少投资机会。

但是最大的投资机会不在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投资仅是用于现有设施设备的升级改造，而大量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收益会更高。世界银行的研究资料表明，如果将非洲的基础设施提高到毛里求斯的水平，其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会增加 2.1%，如果将其提高到韩国的水平，其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会增加 2.7%。如果将印度的电力供给提高到以色列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水平，其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会增加 1.7%。如果阿根廷的铁路能够达到韩国或中国台湾地区的水平，其经济增长率会增加 1.4%。

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着资金不足的严重问题。印度的五年计划中提出投入一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但国内仅能解决五千亿美元。如果能解决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的问题，那么世界经济能够走出危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这一点，在欧洲，今年 2 月欧洲央行和欧盟发起了新的方案：2011~2020 年欧洲投入 1.5~2 万亿欧元用于改善欧洲的基础设施。欧洲的方案是对的，但还应有更大的格局。解决发达国家的产能过剩问题，不应局限在发达国家内部。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虽有改善的机会，但其投资效率不及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发达国家和巨额外汇储备国家应该将大量资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能直接带动对资本品的需求上升，从而对发达国家的需求也上升了，因为发达国家的产品以资本品为主。

国际社会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步伐还不够快。目前世行与新加坡政府共同设立了东亚基础设施基金，世行和新加坡政府各投入 2 亿美元，希望再动员 6 亿美元其他来源的资金共同努力。这是发展方向，虽然与欧洲 2 万亿欧元的投入相比规模有限。

这也让人对于国际经济的发展前景感到审慎乐观。目前方向已经

明晰，方案已经明确，但形成社会共识还需要一段时间，国际经济在一段时间内还有不少不确定性。

二、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目前看来，中国经济比较乐观。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经济维持了平均每年 9.9% 的增长率，在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如此大的国家出现如此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当前中国的人均 GDP 在 4000 美元左右，而美国为 50000 美元，中国仅为美国的 8%。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08 年中国的人均 GDP 已经相当于美国的 21%。未来中国持续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潜力仍然存在，中国仍有可能再维持 20 年 8% 或者更快的经济增长，届时（到 2030 年）中国的人均 GDP 按照官方汇率计算能够达到美国的 25%，按照 PPP 计算则能够达到美国的 5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因为经济发展靠技术的提升和产业升级，过去与中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路径为我们提供了参考的样本：1951 年，日本的人均 GDP 按照 PPP 计算相当于美国的 21%。台湾地区 1975 年、韩国 1977 年，各自的人均 GDP 按照 PPP 计算也是接近于美国的 21%。而日本在 1951~1971 年的二十年间经济增长速度高达 9.2%，台湾地区在 1975~1995 年的二十年间经济增长速度高达 8.3%，韩国在 1977~1997 年的二十年间经济增长速度也达到了 7.6%。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道路与东亚的发展路径是一致的，其要点就是引进资金、技术，快速的产业升级，利用国际大循环作为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的潜力取决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如此看来，8% 的年均增长率并不是过高的估计。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日本的人均 GDP 从 1971 年占美国的 21% 上升到 1991 年的 65.5%，台湾地区从 1975 年的 21% 上升到 1995 年的 54%，韩国从 1977 年的 21% 上升到 1997 年的 50.2%。中国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人均 GDP 也有可能达到美国的 50%。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届时中国的整体经济按照 PPP 计算就会达到美国的两倍，市场规模是美国的两倍，即使按照官方汇率计算，经济规模也会与美国相当。

对于中国来说，需要着力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继续沿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向前进，在国际化的开放体系中寻找自身优势、开发增长点。面对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中国应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政府需要有世界眼光，既要实事求是地考虑国内的情况和问题，也要实事求是地考虑中国的增长对世界的挑战和影响。相信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远矣。

（整理：冯明亮）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东大街 8 号东联大厦四层		
电 话：	(010) 84080188	邮 编：	100009
传 真：	(010) 84080188	网 址：	www.cdrf.org.cn
本刊主编：	卢 迈	电子邮箱：	cdrf@drc.gov.cn
